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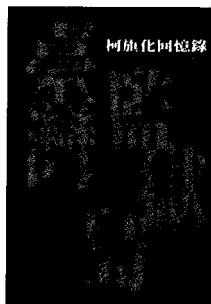
P92-94

故鄉山丘下白百合的風姿——

讀《臺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蕭 阿 勤



臺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

柯旗化著 / 第一出版社

9106 / 250 元

ISBN 9579893969 / 平裝

1970年代末，筆者因故從高中休學。那一年的夏天，我無所事事，每天一早，躲在中部故鄉小火車站旁廢棄的防空洞中，啃讀柯旗化先生所著的《新英文法》。經過一個夏天，精裝的書背已經鬆脫。筆者的英文底子，就在那時候打下比較實在的基礎。在臺灣，許多像我這樣三、四十歲上下、受過中學教育以上的人，早年在苦學英文的過程中，都曾受惠於柯先生此書，以及他的另一本《英語單字成語手冊》。30年後的今天，走進任何都會區常見的大型連鎖書局，或是鄉鎮的小書店，仍然可以看見柯先生的著作，以更精美的裝幀擺在架上，吸引莘莘學子的目光。

自三十多年前到現在，從我這個年紀上下到更年輕的世代，即使熟讀柯先生的文法著作，受惠良多，但絕大多數恐怕除了柯先生的大名三個字之外，對他可以說一無所知。《臺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中譯本的出版，總算彌補這項遺憾。這一次，再度由柯先生親自告訴我們的，不再是那些化繁為簡的語文規則與知識，而是他個人身為政治犯

而血淚交織的故事。由於這本回憶錄的問世，也才使像我這樣熟背過《新英文法》而深知其廣大影響的讀者驚訝地發現：原來這本曾經幫助我們許多人在英語學習之路上順利前進的著作，是六〇年代作者在牢獄中改訂增補完成，而在那一頁頁的文句背後，埋藏著不尋常的故事。

柯先生文法著作的暢銷和廣大影響，與其做為政治犯身世的少為人知，形成強烈對比。戰後由於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臺灣人對於自身獨特歷史經驗的記憶，尤其是那些被認定為具有反國民黨意識者，往往備受壓抑，無法公開自由傳佈。九〇年代以來，關於過去被視為禁忌的往事，逐漸有不少的史料整理與二手研究出版。那些跨越日本殖民時期與戰後的本省籍年長世代的個人日記、傳記、回憶錄、憶往的雜文等，也逐漸刊行問世。譬如與柯旗化先生年紀相近、同樣也坐過政治監牢的本省籍文學耆老葉石濤先生，在1991年結集出版《一個臺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回憶他在那一段跨越兩個不同時代、身受國民黨白色恐怖迫害的慘澹歲月。類似地，柯先生也在1992年於日本出版《臺灣監獄島》。可惜的是，本書雖已問世10年，但是對本地不懂日文的讀者而言，仍然無緣深入瞭解柯先生的特殊遭遇。如今中譯本刊行，終於可以消解這項遺憾。

柯先生在1929年出生於高雄左營。在全書6章中，他追述至九〇年代初的一生經歷，包括：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在公學校與中學求



學、在戰時加入日軍學生兵、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戰後考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二二八事件、四六學生事件、畢業後任教、1951年第一次被無辜牽連而以「思想左傾」入獄管訓、出獄復任教職、結婚、出版《新英文法》等暢銷書、1961年再度被捕而以「預備叛亂罪」起訴、1976年出獄後的詩文寫作與創辦《臺灣文化》季刊等經過。其中佔全書約五分之二篇幅的，是他兩次入獄而輾轉於高雄警察局拘留所、臺北保安司令部保安處、內湖與綠島新生訓導處、臺北軍法處看守所、警備司令部安坑分所、臺東泰源監獄、綠島感訓監獄與新生感訓隊的悲慘遭遇。關於這前後共計17年左右的政治苦牢，柯先生紀錄了白色恐怖統治下國民黨政府的安全單位如何以監視刺探、牽連羅織、威脅利誘、刑求逼供、誅殺入獄等，殘酷地壓制當時被認為具有反國民黨意識而挑戰其統治者——包括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思想左傾、有共產黨嫌疑、實際參與共產黨活動、主張臺灣獨立、或實際從事臺獨活動者。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異議份子與行動，顯示戰後初期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並未穩固。至於國民黨政府的監控羅織，則充分展現一個流亡政權極度的不安全感。

除此之外，根據柯先生五〇年代初次入獄所見，外省籍政治犯並無身為中國人的優越感，而與本省籍政治犯相處良好，「共產黨系和臺獨系之間還看不出對立及摩擦」。但基於六〇年代再度入獄的經驗，柯先生則透露了政治犯之間涉及省籍身份、國族認同、政治理念等的複雜關係，其中包括本省籍「臺獨民主派」與「共產黨派」政治犯之間的對立，本、外省籍共產黨派政治犯的合作，以及外省籍「國民黨派」與共產黨派聯合對付本省籍臺獨民主派等。柯先生以身試煉而來的這些見聞，為我們留下五〇、六〇年代臺灣異議政治的寶貴紀錄。

雖然有本、外省籍共產黨派政治犯合作的現象，但柯先生在政治牢獄經歷的追憶中時

常呈現的，則是監獄中明顯的省籍衝突，而這同時包括管理人員與政治犯在內。在這黑暗小天地中的本、外省人對立，毋寧是二二八事件後臺灣社會廣泛省籍問題的縮影。柯先生從親身經歷戰後初期國民黨的不當統治，到無辜牽連下獄，甚至在獄中也因為身為本省人或臺灣人而受污蔑挑釁，因此他在書中毫不掩飾對外省人或中國人、中國政府（包括過去的國民黨政府與當今的中共政權）、中國民族性的強烈嫌惡，而直率地加以譴責。對他而言，接收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無疑是「大陸來的侵略者」，而日本戰敗後臺灣人沈醉在解放的喜悅中，不知道接受中國統治就是「淪為中國殖民地」，將會備受封建野蠻的中國統治者的壓迫與「貪得無厭的中國人剝削」。

和這些對外省人或中國人、中國政府、中國民族性的嫌惡與譴責構成明顯對照的，是柯先生對日本在臺統治正面影響的肯定與懷念。八〇年代以來，本地不少通俗著作或學術研究都認為，戰後初期臺灣社會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可以理解成日本殖民統治形塑的「現代性」與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特質的衝突。類似地，對柯先生而言，中國文化是數千年封建專制政治的產物，中國社會拒絕外來文化而無法趕上時代潮流。至於臺灣人，則歷經外族統治，早受西方文化影響而有世界觀與進步思想。對他來說，抱著大漢沙文主義而「有如19世紀封建官僚」的中國統治者，與「在日治時代受過近代化教育擁有20世紀進步民主思想」的臺灣人，自然發生摩擦對立。追憶日治時期在校內與課外勤奮學習的經過，以及八〇年代後臺、日師生或同學的重聚與情誼，柯先生直接地概括指出，日本才是他們那個世代的「文化故鄉」。對他來說，「只要受過日本教育，即使是中國人也不惹人厭」，而戰後臺灣政治文化與社會人心的墮落，正是那些中國特性污染的結果。

柯先生對外省人與國民黨政府的痛惡，以及對日本在臺統治的懷念，很典型地呈現了



許多歷經兩個政權的臺灣人經驗與感受。相信今天三、四十歲上下的本省籍讀者，不少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曾聽過父執輩不經意地流露類似的感喟。柯先生直率坦誠的言語，正是這個世代歷史經驗的珍貴紀錄。就像柯先生指出的，包括他自己在內，臺灣人「因對中國人起反感而變得明顯親日」。就他本身的悲慘遭遇而言，其嫌惡外省人和中國特質與親善日本的對比，遠比許多人的父執輩強烈，這一點自然可以理解。就像柯先生的公子柯志明在本書〈後記〉中所言，「大家設身處地去想，同他一樣承受如此折磨，要如何才能得心平氣和？」

柯先生在書中對其一生的追憶，並不是簡單的事實照錄。就像柯先生自述，他「本來不過是一個對政治不感興趣的英語教師」，「卻被扭曲成思想犯而入獄強制勞動，因而引發我對國民黨政權的反抗意識」。在九〇年代初抒寫此書，柯先生夾敘夾議，對過去經歷的平實描寫，以及對臺灣戰後至今現實的尖銳批判，兩者不斷交替。在某些地方，我們很難區分那一部份是柯先生過去如實的心境寫照，那一部份是他歷經苦難之後的感悟變化。在柯先生的敘事中，對過去的懷想、對現在的感受、以及對未來的期望，事實上已混融不分。在對過去經歷的平實描寫之外，書中不斷率直地披露的，是他對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追求自由、獨立、民主的政治前途之堅定信仰。這本書原來在日本出版，既有意使日本讀者瞭解在國民黨統治下，不只柯先生等政治犯遭囚禁的火燒島是個「監獄島」，而且「整個臺灣島也可以說是一個大監獄」，並進而呼籲日人理解、支持臺灣人這樣的政治追求。「臺灣一定會獨立。爲了要迎接臺灣獨立的日子，我才活著。」——這是柯先生回憶錄最後簡單的幾句。對照柯先生初次入獄所見不知名的政治犯在牆上給情人的絕筆，以及他本人再次入

獄而給柯夫人的遺書，那幾句有力的結語，令人動容。

在臺灣當前族群與民族主義的認同政治脈絡中，柯先生如此鮮明而堅定的政理想，也許會使這本回憶錄引起一些複雜的回應。讀者甚至可能因爲政治信念的歧異，低估了柯先生的故事可能傳達給我們的意義與啓示。族群與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歷史告訴我們，其中的對立、屈辱、與仇恨，幾乎無可避免地涉及對於別人故事的不屑一顧——對別人涉及自我認同的歷史敘事漠然以對、甚至嗤之以鼻、壓制排斥。要減少這種冷漠、譏諷、與敵意，以及伴隨而來的對立、屈辱、與仇恨，也許有不少方法，但其中之一至少是在適當的時候認真而接納地對待他人的故事。如前所述，那些跨越戰前與戰後兩個時期的本省籍年長世代不見容於當道的歷史記憶，一直到九〇年代之後，才藉著各種媒介形式在公共領域重見天日。柯先生的回憶，無論如何，至少可以在讀者心中勾起的，是一如柯先生本人在獄中凝望待決死囚時的感思——「不用去想什麼正邪善惡的問題，這是在政權存亡血腥鬥爭中不幸淪爲犧牲者的身影」。如此低抑無言的悲歌，不管個人的政治取向如何，都應耐心地傾聽。那些從不傾聽他人以血淚構築的故事者，注定自私地壓迫他人，或者無知地爲人驅使。認同政治中難見的美德之一，正是謙卑地傾聽。唯有傾聽，才能使頑者廉，懦夫有立志。

一位無心於政治的英語教師與英文法作者，一位生性澹泊而愛好詩文的知識份子，在時代無情的播弄下，無端深受政權支配者的殘害。柯先生在書中封底的親筆題字中，那「故鄉山丘木蔭下清香的白百合」，也許是他自己最佳的寫照。潔白柔弱的百合，雖然無力抗拒那暴力的摧殘，然而無欲則剛，那以身試煉而來的回憶，正有如它昔日綻放的風姿，觸動人心。